

一个“大男孩”

见到陈斐孺时,这个身高近1米9的上海壮汉正身穿一套华丽的唐甲,在自家工作室为甲冑自媒体当模特拍摄素材。

他举起右拳,摆出怒目圆睁的造型,那形象宛若年画中跑出来的“门神”,引来摄影师一阵猛夸,这让陈斐孺很是得意。但在不明就里的人看来,这不过是瞎胡闹,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爱好的意义。对此,陈斐孺常常用自己的微信名来回应——“适口者珍,惜味者贵”。

陈斐孺是一位典型的“70后”。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隋唐演义》连环画长大的他,特别喜欢里面的武将英雄,从小就想象着自己身披重甲驰骋沙场的样子。但让男孩没想到的是,这个梦一做就是40多年,至今还没能“醒”来。

1994年,陈斐孺成为上海第一批糕点师,后来又担任一家食品公司的中层领导,年薪过10万元。这在上世纪90年代算是高薪人群。日子好过了,陈斐孺就想着买些儿时可望不可即的东西,比如中国铠甲。但因为太过冷僻,十多年前即使有钱也基本买不到,他只能退了一步,买了一套日本铠甲。买回家看看去,陈斐孺总觉得不对劲,内心里还是喜欢中国人自己的盔甲。

有没有可能自己动手打造一套中国盔甲?陈斐孺说干就干。但想想容易,操作起来难度很大。

在冷兵器时代,甲冑是最重要的战争装备。战士披甲与否,其战斗力会天差地别。因此,盔甲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受到严格管制,严禁个人私藏。加上甲片、皮革、束带等部件不易保存,造成现存于世的完整中国古甲极为稀少,大多只剩一些残破甲片。

没有实物参考,意味着国甲的复原仿制极为困难,胡乱仿制的看不上,能看上的买不到。直到2015年,陈斐孺在一个论坛上看到一张身披银色盔甲的“武将”骑射的照片,当时便大为天人。经朋友介绍,他结识了盔甲的制作者、广东惠州一位名叫何东明的盔甲师傅。他当即下了2万元定金,约定3个月交付。

没想到,后面出现了许多曲折。

四个“傻瓜蛋”

支付完盔甲定金,陈斐孺开始了漫长的期待。等到“花儿也谢了”,心仪的盔甲还是一枚甲片都没见着。

说好3个月交付,一拖就是1年多,陈斐孺一度觉得自己遇到了骗子。他一路追到西塘,为何东明摆下一桌“鸿门宴”,想给他点“颜色看看”,顺便把定金讨回来。

谁能想到,两人竟然一见如故,聊了个通宵,“鸿门宴”变成了“拜把子”。陈斐孺发现何东明不但不是骗子,还是一个对生意一窍不通的“甲痴”。迟迟无法交货,是因为何东明之前接了一个名为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电视剧组的“大活”,短时间内要制作近200套盔甲,完全没有时间制作零单。

陈斐孺一听,DNA动了。他决定去何东明广东惠州的五金厂亲眼看看制甲过程。那次把他看呆了:仓库内的盔甲成品、半成品可谓堆积如山。何东明只管造甲不管卖,制甲技术越来越好,生意却一塌糊涂,小作坊眼看要倒闭。陈斐孺本以为,这种奇人异士只会出现在小说里出现。

“你还是和我一起干吧。”陈斐孺热情邀约,何东明同意入伙,再加上陈斐孺的两位朋友,“函人堂”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。

随着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热映,一套套制作精良、贴近史实的唐代甲冑犹如从壁画、石刻中走出,成为剧中亮点。作为道具盔甲的制作方,“函人堂”品牌也一炮而红,得到了国内外爱好者的认可。

打造中国盔甲,重现铁血荣光,听上去简单,实现路径却痛苦而漫长。四个性格脾气完全不一样的人,为了共同完成一件听上去匪夷所思的事,不停磨合、互相妥协。每晚10时30分,他们都要雷打不动地开线上会议,有时为一个甲冑的细节争论半天,有时互相打气进行心理建设,有时因理念不同大吵一架。看着四个大男人深更半夜为了类似“甲片是方是圆”的事情吵到面红耳赤,陈斐孺的妻子总是无奈地摇头苦笑:“四个



本报记者 李一能

■ 在“函人堂”位于虹口区的工作室内,数十套甲冑依次陈列
本版摄影 记者 陈梦泽

上海「函人」

虹口区广中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里,最“弹眼落睛”的莫过于四套以宋、明武备为原型的中国盔甲。

这些甲冑式样精美、做工精良,每一个细节都力求还原历史原貌,令前来参观的市民啧啧称奇。更出人意料的是,它们竟然出自上海虹口的一位糕点师傅之手。

“做最软的糕点,造最硬的甲冑。”这是“函人堂”创始人陈斐孺过去十年生活最真实的写照。十年来,他与同伴手工制作了几百套甲冑,其中不少曾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《夜不收》等热播剧中惊艳登场。

“函人”一词出自《周礼》,意为盔甲匠人。这一古老职业早已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而消失。但陈斐孺这位“重现江湖”的当代“函人”,不仅用满腔热爱和精湛手艺“复活”了中国传奇甲冑,也乘着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东风,以最鲜活的态度传承着华夏延续千年的武备文化。

傻瓜蛋!”

对于妻子的评价,陈斐孺很认可:在国甲复兴这件事上,只有“傻瓜蛋”才能坚持。

考据“偏执狂”

陈斐孺对于产品的品控历来执着,这是他当糕点师傅养成的习惯,毕竟食品安全人命关天。但将这份执着用在制甲上,受折磨的不光是他自己,还有他志同道合的兄弟们。

为了仿制出最接近真实的甲冑,老陈成了一个考据“偏执狂”。由于缺乏实物参照,每套盔甲的细节只能通过文物、古画、石雕、文献等考据,再通过推理尽量还原,复杂的过程堪比一场考古。有时团队跋山涉水跨越千里,为的只是确定盔甲上的一个小细节。



▲▼ 为了尽可能还原历史,铸甲师们对每一片甲冑都用心打磨



■ 说起参与设计的甲冑,陈斐孺如数家珍

陈斐孺最“呕心沥血”的作品,是一副仿宋代山纹甲,原型是宁波东钱湖南宋石刻群中的一尊将军雕像所着的甲冑。这副甲冑最大的特点,就是甲片呈“山字形”。这是中国独有的一种锁甲,曾屡屡出现于史料记载与画像雕刻中。但迄今考古未发现一枚实物“山字形”甲片,这令它成了甲冑研究领域的“千古之谜”,其结构与材质至今仍未被完全破解。

为了还原这套山纹甲,陈斐孺去东钱湖实地考察了五六次,记录下石雕的每一个细节,拍摄了大量照片和视频资料,再辅以宋代《武经总要》等大量历史资料的佐证,通过3D建模完成甲冑设计。

花费数十万元,历时数年之久,陈斐孺先后制作了三个版本,但仍觉得不满意。目前,

他正在筹划制作第四版的山纹甲,“我们目前的猜想是这种甲冑可能不是用来作战,而是用于仪仗,山纹甲片材料有可能是布帛,这可能是其无法存世的原因”。

这样的“偏执”,令“函人堂”成为甲冑爱好者心中的国甲第一品牌,无论做工、品质、材质、结构科学性,还是历史还原度几乎都无人可及。“最贵的一套甲冑价值50多万元,便宜的也要过万元,价格远超同类商品,一年也有数百万元的销售额。”陈斐孺称即便如此,“函人堂”还是不怎么赚钱,因为设计制作成本居高不下,又不愿在品质上缩水妥协。直到现在,陈斐孺为“函人堂”定下的目标还只是“活下去”。

甘为“守艺人”

打造一个盔甲民间博物馆,将中国历史上所有传奇甲冑复原——陈斐孺和团队至今仍为这一梦想而努力。

“函人堂”目前的线下展示厅,位于虹口区沪办大厦。房间内陈列着数十套国甲,风格从秦汉到明清,历史跨度长达2000多年:秦兵马俑所穿的大漆皮甲、西汉远征匈奴时的骑兵铁甲、创中国重甲之盛的宋代步兵甲、造型华丽之极的唐明光铠……说起自家的甲冑,陈斐孺如数家珍,如果遇到同好知己,每一套盔甲背后的故事,他都愿意说上整整一天。

在陈斐孺眼中,一套套甲冑不仅是艺术品,更像是历史书。作为曾经的“国之重器”,盔甲是古代中国国力、军事、经济、科技、艺术、文化等要素的聚合体。因此,要完成一套国甲的仿制至少需要上百道工序,包含锻打、篆刻、花丝镶嵌、甲片打磨等,特别耗费人工,制作周期特别长,普通的一件甲冑都有上千块甲片。

以仿明代皇帝仪仗甲士盔甲为例,这套锁子甲重20多公斤,有9000片铜质甲片,每个甲片都要经过打磨,完成整套盔甲要3个月。“这些盔甲的细节中,有着当时社会各种生产制造业的缩影,涉及冶金、纺织、镶嵌、雕刻、制皮等多种传统工艺,远非很多人想象中只要敲敲打打就能完成。”他说。

对于陈斐孺来说,制作甲冑的过程,就像是在和古代工匠时空对话。“只有自己亲身参与,亲手制作,才能理解先辈们的匠心与巧思,这是任何书本上都无法学到的知识,对于中华民族璀璨文明的认识与敬仰,会更加深刻,这也是我们能坚持到今天的最大原因。”

陈斐孺觉得,走到这一步,已经不能回头了。“老祖宗最宝贵的手艺,既然到了我们手上,就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。”如果说初入甲冑圈是为了圆一个大男孩的儿时之梦,如今成为“国甲守艺人”是使命与责任的觉醒。

梦想“践行者”

多年来,陈斐孺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:如果只是孤芳自赏,只满足小众圈子的爱好,他们的“函人之路”肯定会越走越窄。如何让早已被时代抛弃的甲冑,能够在当今社会焕发全新价值,是“函人堂”能否在未来实现突破的关键。

去年,陈斐孺向虹口区广中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捐赠了多套国甲,作为展品让公众免费参观,他有时也作为志愿讲解员,向市民讲述国甲背后的故事。“很多人都好奇,为什么会在这里展示古代盔甲?我告诉他们,这些甲冑守护了我们中华民族千年,历朝历代的战士穿着它们保家卫国,和当今的红色国防文化,是一脉相承的。”

令陈斐孺感到欣喜的是,许多小朋友观众对于国甲文化非常热爱且了解,知道它们的名称和朝代,甚至有些细节特点也说得八九不离十,让陈斐孺犹如看到了儿时的自己。“只要孩子们能坚持这一爱好,国甲复兴就有了基础,老祖宗的手艺就不会失传,下一代‘函人’很可能会出现在他们之中。”

陈斐孺说:“现在的最大梦想,就是找一个交通方便的地方,开一个民间国甲博物馆,展示历朝历代的国甲,免费向社会开放。”他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穿上国甲的那一刻,身体里的荷尔蒙一下被点燃,令他犹如回到了金戈铁马、烽火连天的古战场,卫青、霍去病、岳飞、戚继光……那些传奇名将仿佛瞬间附体,激励着他在这一条圆梦之路上一往无前。